

# 制约我国智库研究与发展的瓶颈问题\*

——跨学科研究与专题性研究资源保障

袁曦临 (东南大学图书馆 南京 210096;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1189)

**摘要** 在文献调研和综述基础上,文章以案例研究方法揭示出中美智库在研究、资源建设和保障方面的差别,指出智库的研究质量取决于智库的思想性和研究性,而智库的研究性又取决于多元化的跨界研究与专题化的研究资源建设。

**关键词** 智库 专题资源建设 厚数据 跨学科研究

## On the Bottleneck Problem Restricting the Think Tank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Thematic Research Resources Support

Yuan Xilin

(Southeast University Library, Nanjing, 210096;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 and literature survey, the paper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among academic research, information supporting and resource construc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A think tanks, further pointed out the quality of think tank research lied on ideology and study level, and high-level study of think tank certainly depend on 2 aspects: topical research resourc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Keywords** think tank, topical collection, thick data,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智库”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独立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现代决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尽管世界各国的政治环境不同,但智库承担的社会职能还是趋向一致的,其终极价值是依赖智库专家的意见和思想,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包括与政府、企业、社会生活及大众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支持政策制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舆论。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了重要批示。2015年1月中办、国办联合公开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伴随着我国各级政府公共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智

库正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

我国的智库系统大致可分为体制内智库和民间智库两大类型。前者依据其主管机构又可分为中央直属系统,如中央党校;国务院直属系统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部委直属系统如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高校系统如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等。后者属于体制外社会组织的范畴,如北京安邦、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等。2015年1月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发布了《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sup>[1]</sup>。报告依据专业影响力、政府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这四类主要影响力指标对国内智库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高校智库协同发展模式及其路径选择”(编号:ZDIXM018)的研究成果。

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环保部环境规划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被列入中国影响力最大的Top10智库。2016年12月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发布了双方共同研发的我国首个智库垂直搜索引擎和数据管理平台CTTI。在CTTI来源智库(2017—2018)的入围名单中,北京、上海、江苏占据入围智库的前3位,在489家来源智库中,高校智库共有255家,占52%;党政部门智库68家,占15%;社科院智库46家,占9%;党校行政学院智库44家,占9%;社会智库36家,占7%;媒体智库11家,占2%<sup>[1]</sup>。不难看出,国内智库系统呈现政府智库、民间智库、高校智库“鼎足天下”的局面。

然而,评价一个智库的水平终究还是要看其能否产出有针对性的、有质量的思想产品,智库的影响力不可能仅仅来源于舆论的推送和宣传,那只能造就表面繁荣和发展泡沫。智库的核心功能是产生新的思想。智库的价值就在于通过调研、分析和研究,提出政策主张和思想观点,引领和支持政府决策;并通过在媒体上发表见解、文章,解读国内、国际问题和公共政策,影响舆论。换言之,“思想”与“研究”才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 1 国际智库研究范式的变化

从历史角度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智库历来强调其“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色彩,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非意识形态的政策研究中心。以美国智库为例,大致可分为3大类型:自主型和独立型智库(Autonomous and independent)、半独立型智库(Quasi independent)以及其他政府智库、大学附属智库、政党智库等,这三者在全美智库中的占比分别为75%、15%~20%、5%~10%<sup>[3]</sup>。半独立型智库是指独立于政府,但受到利益集团、捐赠者或其他群体的支持与控制,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主要来自共和党的支持,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主要接受民主党的支持。从目前的这个比例情况看,美国智库依然以独立、中立、公开的面貌出现。但是,近30年来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智库数量在逐渐增加。

### 1.1 智库研究立场的意识形态化

在美国,大多数智库都会在总统就任前后公布其

政策思想方案,以期对新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 of United States)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报告,成为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中“主流派”的意见<sup>[4]</sup>。

虽然美国主流的智库都强调不为党派“站台”,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预算为9100万至1亿美元,80%来自捐助(捐助资金的80%来自私人,5%来自基金,15%来自美国、阿联酋、丹麦等国政府),10%来自理财收入,其他则来自培训和出版收入。布鲁金斯学会会有400名工作人员和200名不驻会的客座研究人员,还有60~70名访问学者。学会要求其研究人员承诺不为某一个党派“站台”,不得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办公资源,否则就必须辞职。但是,由于美国智库为人所熟知的“旋转门”机制,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可能参与到政府事物和工作中。通常情况下,如果民主党执政,则智库中具有民主党背景的研究人员会进入政府部门从事战略与政策研究,留下或新进入的研究人员则多数为共和党背景。反之,共和党执政,则共和党背景的研究人员进入政府,留下较多具有民主党倾向的研究人员<sup>[5]</sup>。因此,智库始终扮演了政府智囊的角色。

尽管智库管理过程中,一再强调政治立场中立,研究者要具有开放的视野,进行客观和严谨的科学分析,但实际上不可能完全不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无论是智库本身还是智库研究人员,都不可避免地嵌入在特定的政治环境、政党结构、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环境之中。目前,美国的保守主义智库在数量已远超自由主义智库。美国3/4的保守主义智库在遴选专家时首先考虑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其次才是专业知识和媒体或公共事务经验;而自由主义智库则更注重专家的专业知识和教育背景。自由主义智库在美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主要致力于政策分析与研究。但目前也在某种程度上背离其固有传统,研究较多的从过去的政策前端研究诸如世界形势预测、战略研究、政策研究等,转向政策后期对特定政策方案的宣传和政策方案的提出,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或意识形态倾向<sup>[6]</sup>。与此同时,美国智库在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传统作用也在削弱,2016年的美国大选从某种意义上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

智库研究立场的意识形态化,这一点已经为美国智库专家普遍关注,他们通过不同途径提出智库应该回到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认为智库不仅要独立于特殊

利益,更要相对独立于国家,这样才能保证政策研究的价值,不以官僚系统的价值和偏好为转移,因此,需要更多的从基金会和民间团体获得资助,以避免以党派的决策结果作为衡量激励和管理标准,否则,智库终将失去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 1.2 智库研究方法的实证化

从智库研究方法上看,近30年来实证主义方法在国际智库研究中呈主流态势,逐渐从基于历史经验的描述转向基于事实数据的分析挖掘。从某种意义上讲,智库研究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循证咨询,即通过资料分析和数据挖掘,发现研究对象的内在特征与规律,寻找政府决策的直接或间接证据。

历史分析方法一般致力于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全景扫描,发掘本质特征,预测未来发展轨迹。因此历史分析法常用于对政治或国际关系的分析,通过对照历史现象和概念背后的关联,判断异同,分析缘由,把握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等。相比于历史分析方法,实证主义方法更重视事实和数据的支撑,重视逻辑推理,因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和观点更为可靠、客观和中立。

上述两类方法,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只有适用与可行之别。但总的说来,实证主义的研究倾向在近年来的智库研究中更为突出。原因在于智库所面对的研究问题往往直接关照现实,此类问题如果仅仅通过理论阐述与历史分析,很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不易得到真实客观具有真正指导意义的结论。事实上,只有对大量相关事实数据的分析比较,或与历史数据参照检验,或对异常数据的探究挖掘,才有可能进行提出具有建设性的风险预警和收益评估。也正因此,美国一流的社会科学学术机构都非常重视对于相关社会问题领域事实数据资源的建设,例如芝加哥大学GSS(General Social Survey)综合社会调查项目,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ISR(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以及校际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联盟ICPSR(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哈佛-麻省理工社会科学数据中心HMDC(Harvard MIT Data Center)等。其中ICPSR收藏了超过50万份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据文档,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等16个学科<sup>[7]</sup>。简言之,充实的历史数据和相关资源是智库研究得以进行的坚实基础。

即便是在传统的历史分析领域,也出现量化的

倾向。20世纪50年代计量史学在美国兴起,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中一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计量史学方法并不是简单的将数字作为史料,而是运用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过各种数据关系和创建数学模型来对史料进行处理揭示,论证说明历史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联系。简言之,就是运用数学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通过事实和数据作为论据支撑,完成复杂的社会研究,以避免历史学家基于个人认知和社会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随意抽取一些史料来证明自己的结论。计量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纠偏作用,促使历史分析走向精密化。

## 2 我国智库研究与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个智库的质量取决于智库的思想性和研究性,而智库的研究性又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智库专家及其研究能力和面向问题而非学科的专题研究资源。

### 2.1 智库专家及其研究能力

以布鲁金斯学会来说,其聘用研究人员标准主要是看其在所研究领域中学术积累是否深厚、具有前瞻性思维和广阔视野,并且在公共领域具有影响力。美国智库的研究人员总体来说可以自己设定研究题目,在研究选题和研究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不需要承担其他行政工作,这也从一个方面保证了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相较于美国,我国的政府智库更多扮演的是政府智囊的角色,目前政府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与重视,获得了充足的财政资源资助。尽管我国智库迎来了发展的上升时期,但在研究水平和研究方法上还是存在一定差距,智库研究方法仍以历史分析方法和理论阐述为主。举例而言,作为国家战略性决策的“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及中亚、独联体在内的诸多国家。与如此众多的国家进行经济贸易交往,可能遭遇的问题非常多;面对问题,政府决策部门不仅需要国际关系专家,更需要东南亚问题专家、巴基斯坦问题专家、中亚问题专家等国别研究专家,就具体问题提出理论参考和解决思路。以巴基斯坦为例,2013年5月中国提出“中巴经济走廊”倡议,在这一倡议框架下,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51个项目与备忘录,涉及经贸、能源、文化、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这些项目无疑建立在自愿平等、互利共赢基础之上,然而不到3年的时间,巴基斯坦国内就对此倡议框

架提出了质疑,甚至不满<sup>[9]</sup>。这使人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即在“中巴经济走廊”倡议提出之初,智库研究人员有没有预见到问题可能发生,并且提出预警?

## 2.2 面向问题的专题研究资源

影响到我国智库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所需要的大规模专题研究资源与数据。我国学者在研究中更多倾向于采用历史分析方法,或借助于某一理论视角进行阐述,而不擅长见微知著的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因此,围绕研究问题建立高度专题性的事实数据资源,不仅是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结论是否可靠的保障。智库所希望实现的对战略发展方向的科学定位、对政策需求的准确预测与快速响应等,无一不是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准备基础上,只有在信息尽可能完全的基础上,克服信息不完全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才有可能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同时将决策过程中的风险性降到最低。因此,高质量高水平的智库离不开精确、全面和专业研究资源的支撑与保障,专题研究资源是智库发展过程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要素和重要保证。

专题研究资源的建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智库发展的瓶颈,面向研究问题的专题资源建设是智库研究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整合打造了11个专业化新型智库,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意识形态研究智库、财经战略研究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生态文明研究智库、国家治理研究智库、新疆智库、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国家全球战略研究智库、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廉政研究中心<sup>[9]</sup>,以便能够跟上智库发展小型化和专题化的国际趋势。

## 3 高质量专题资源建设是智库研究之基础

上述分析,提示了两个重要的智库研究原则:一是多元化理论选择之重要。当研究者们使用同一种理论或采用同一视角进行分析时,其研究结论的同质化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相应的,出现结论偏差的可能性也就大为增加,因此,智库研究需要多元化的理论视角,形成跨界研究模式。二是专题化研究资源建设之重要,研究资料和研究数据的获取、收集和整理对于智库研究者而言不仅仅是工具,甚至就是研究本身。没有学术资源的储备,任何研究都难以为继。

### 3.1 多元化的跨界研究模式

智库研究不是一种单一的政策研究或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是直接面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因此其研究的重

点必须要放在无所不包的社会层面,才能看清楚其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多元集成的“跨界”研究模式使智库的研究规范从单一学科研究为主导,诸如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阶段发展至跨学科整合研究层次,面向研究问题和现实存在,建立和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

国外的智库研究历来主张提倡对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研究、区域研究放到跨学科的背景下进行综合研究,广泛应用历史学方法以外的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强调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举例来说,1955年成立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是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大本营,这个研究中心不仅是东亚问题的研究中心,更是中国研究的智库。在研究思想方面,费正清(J.K. Fairbank)、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都深受年鉴学派总体史观的影响,致力于长时段的研究,认为中国历史文化是连续不断、自成一体的。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认识,才能理解它的近现代变迁。在方法论上,主张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学为核心整合其他学科,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建构历史学。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应该是一项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仅仅依靠历史学知识是没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此他极力促成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到东亚研究中心讲学、工作,并成立了“国际与区域性研究委员会”,由此,中国研究发展成为一种综合研究。有关中国文化演变、社会流动、经济体制、税收政策、政治制度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的课题开始融入到历史学中,跨学科的区域研究模式逐渐在哈佛确立起来。

2001年孔飞力在北京中国社科院访问期间,提到其研究选题“海外华人移民史”,国内学者的第一反应主要落在海外华人对国内的支持,例如辛亥革命时期给予孙中山先生的支持等。而孔飞力的研究视角则要复杂和深入得多,他认为海外华人历史正是中国近代史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涉及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以及民族学和国际关系等,包括移民海外的原因、过程、结果,以及海外华人和当地居民、政府的关系等。只有从多个方面去考察,才有助于分析事实,得出有信服力的结论<sup>[10]</sup>。因此,智库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跨学科研究趋势是智库发展必然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拓宽智库研究的范围和深度。

### 3.2 专题化的研究资源建设

另一方面,智库专题研究资源的建设不能仅仅满

足于一般学术文献数据库的检索,而需要更为深入和精细的文献和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汇集,需要把所收集到的学术文献和事实数据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去作长时段的研究,才能够实现从“薄数据”(thin data)到“厚数据”(thick data)的关联。“薄数据”呈现的是事实,回答的是 Who, When, Where, What, 而“厚数据”不仅呈现事实,还包括事实的前后联系和意义,简言之,“厚数据”能够更多揭示表面数据背后的内在原因及其发生机制,即 Why 和 How。实现“薄数据”向“厚数据”的转化,就需要将“薄数据”放到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去分析和研究,完成对研究对象的问题解决和理论创新。

举例而言,近年来在国际冲突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地理问题,国外的相关研究不仅深入,而且有非常扎实的事实数据作为支撑。在学界有着卓著影响的 Aaron T. Wolf 不仅是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地球、海洋和大气科学学院地理学教授<sup>[11]</sup>,还曾担任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的顾问。他的研究集中于跨界水资源与政治的冲突与合作相关问题,将环境科学与争端解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因而在国际水资源管理、水资源制度与政策分析以及环境政策分析等领域有着极高声望。他是约旦河流域水文政治研究的权威,出版过一系列著作<sup>[12-15]</sup>等。他还是教科文组织发展国际水文计划第六阶段(2002—2007年)、教科文组织/ADC 第三个千年国际水域计划和 IWRA 国际合作委员会的成员,跨界水域研究大学联盟的管理者。此外, Wolf 博士参与制订了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水方面的战略,还是《水资源冲突管理和转型计划》的负责人和指导专家<sup>[16]</sup>,通过该计划,他在世界各地提供了讲习班、辅导和调解,并发布关于跨界水域各个方面的专业报告。

基于他持续的专业研究,也为了进一步支持和深化他的研究, Wolf 博士开发了“跨国淡水资源争端数据库”(Transboundary Freshwater Dispute Database, TFDD)<sup>[17]</sup>,该数据库包含若干个子库,诸如国际跨境河流流域组织数据库(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国际淡水条约数据库(International Freshwater Treaties Database, IF)以及“流域风险事件数据库”(Basin at Risk)等,内容涵盖与水资源有关的条约,解决水资源冲突的案例研究及其背景材料,关于与水有关的紧急冲突案件的新闻档案等。涉及跨境水资源的水量、水利设施、水资源管理、水力发电、航行、防洪、灌

溉、划界问题、技术与经济合作等诸多方面。

由此可见,高水平的智库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社会实践,更是学术资源的建设和发展,只有建立起高质量的专业研究资源库,才能够做出有质量和高水平的智库研究,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和政策制定,获得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专题性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数据对于智库研究者而言,不仅仅是研究工具,甚至本身就是研究。以跨境河流域争端为例,除了 TFDD,相关的国际关系数据库还包括:冲突与和平数据库(Conflict and Peace Data Bank Project, COPDAB)<sup>[18]</sup>、全球事件数据库(World Event/Interaction Data System, GEDS)<sup>[19]</sup>、国际危机行为计划数据库(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Project, ICB)<sup>[20]</sup>、战争相关问题数据库(Issue Correlates of War, ICOW)<sup>[21]</sup>。这些数据库可以支持对于河流域争端的原因分析和发展战略研究,包括环境变化因素,诸如自然环境变化、社会环境变化;国家、区域组织的适应能力因素,例如二战后的多瑙河污染问题等。事实上,我国专家在进行有关跨境河流域研究的过程中,也在广泛使用上述专题资源。

#### 4 结语

众所周知,从事学术资源建设的主体是学术图书馆和文献信息中心,这类机构并不主要承担学术研究任务,其对信息资源的建设往往以某一领域的学术脉络为主,着重于对学术内容的组织与揭示,其对学术资源的建设通常是基于学科分类的,实现的是资源的整体保障,而不是面向具体的研究问题或研究专题,因而并不完全契合智库研究者真实的研究资源需求;而承担课题和研究任务的智库专家和研究者在一般情况下,其研究主要依托对相关学术文献资源的检索和利用,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建设和发展自己研究领域内的专题资源。即便收集了相关的专题资源,也只是保存在学术文档中,往往不考虑建设相关的专题资源数据库,以供相关或后续研究者利用。

这一模式一直以来都是学术图书馆和大学、科研院所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合作模式,学者提出文献资源的需求,图书馆通过文献资源的采购予以保障和满足。但是,在智库研究领域,这样的分工合作和资源建设模式是不适用的。因为智库研究面向现实世界和复杂社会的具体问题,具有前瞻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甚至是现有研究不曾涉足的空白点,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如果没有丰富的国别研究资源,没有来自

这些国家内部的文献与数据资源,仅仅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数据库资源,由此开展的研究和得出的结论不仅可能是片面的,甚至可能是十分危险的。

另一方面,我国的智库专家往往不够重视跨学科的研究,囿于既有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畴。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早在反思冷战时就已经指出,绝大部分政治事件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理论的简洁性常以牺牲事物的真实性为代价,只有多个理论视角才能有助于更全面地分析事物的复杂性<sup>[22]</sup>。

现代智库不可避免会朝着专业化、精细化、数字化和实证化方向发展,智库研究也将更加注重大数据挖掘、知识发现、仿真实验、定量建模等数理分析实证研究方法,相应的,对高质量事实数据资源的保障和建设必定会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就目前国内智库的发展而言,专题研究资源的建设与保障问题已经成为高质量智库发展的瓶颈,我国在有关智库的专题资源建设方面非常薄弱,亟待发展。如何以智库研究的真实信息需求为基础,“量身定做”出与其需要配套的“专题导向”的学术资源建设和知识组织模式,理应成为现阶段智库研究各方关注的核心要点。

目前通过政府支持和倡导所获得的智库发展机会,并不能一定保证智库研究质量的提升,也不一定能够改变智库专家研究与智库专题资源建设各行其是的局面。智库存在的本质在于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没有足够的专题信息资源作为储备,智库的研究与发展将只能是无缘之水。正所谓“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没有深入、细致和精确的专题研究资源作为研究基础,要想完成有针对性的、前瞻的,具有决策现实意义的智库研究是困难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智库的发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 参考文献

- [1] 中国网. 2014 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 [EB/OL]. [2016-12-10].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node\\_7218805.htm](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node_7218805.htm).
- [2] 环球网.CTTI 来源智库(2017—2018)入围名单发布[EB/OL]. [2016-12-26]. <http://opinion.huanqiu.com/plrd/2016-12/9824064.html>.
- [3] Raymond J Struyk. U.S. Think tanks under pressure: politics, governance and quality advice[C]. 2016 中国智库治理论坛主旨发言,南京,2016.
- [4] 魏建国:中国智库要出高质量思想产品[EB/OL]. [2016-12-26].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42193642.html>.
- [5]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赴美考察团[N]. 光明日报, 2016-08-10(16).
- [6] 安德鲁·里奇:美国智库专业知识与意识形态的政治[EB/OL]. [2016-12-26]. <http://www.hnzk.gov.cn/zhikuqianyan/5658.html>.
- [7] 张计龙,朱勤,殷沈琴. 美国社会科学数据的共享与服务[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5):13-17.
- [8] 中华网. 从巴基斯坦国内反华游行示威看“一带一路”隐患 [EB/OL]. [2016-12-26]. <http://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60510/22617490.html>.
- [9] 中国社科院建设 11 个专业化新型智库[EB/OL]. [2016-12-10]. <http://cpc.people.com.cn/n/2015/0527/c83083-27063599.html>.
- [10] 吴前进. 孔飞力教授与海外华人研究[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5(2):75-78.
- [11] AARON T. WOLF's Homepage[EB/OL]. [2016-12-26]. <http://www.transboundarywaters.orst.edu/about/wolf.html>.
- [12] Aaron T Wolf. Hydropolitics along the Jordan River: Scarce Water and Its Impact o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M].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3] Asit K Biswas, Aaron Wolf, John Waterbury. Core and Periphery: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Middle Eastern Wate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4] Jerome Delli Priscoli, Aaron T Wolf. Managing and Transforming Water Conflict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5] Aaron T Wolf.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in Water System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02.
- [16] Program in Water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EB/OL]. [2016-12-26]. [http://opensiuc.lib.si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38&context=ucowrconfs\\_2008](http://opensiuc.lib.si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38&context=ucowrconfs_2008).
- [17] 俄勒冈州立大学的TFDD数据库[EB/OL]. [2016-12-26]. <http://www.transboundarywaters.orst.edu/database/DatabaseIntro.html>.
- [18] 密歇根大学的 ICPSR 数据库[EB/OL]. [2016-12-26]. <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web/ICPSR/studies/07767>.
- [19] 马里兰大学的GEDS数据库[EB/OL]. [2016-12-26]. <http://grds.umd.edu/geds/>.
- [20] 马里兰大学的ICB数据库[EB/OL]. [2016-12-26]. <http://www.cidcm.umd.edu/icb/>.
- [21] 北德克萨斯州大学的 ICOW 数据库[EB/OL]. [2016-12-26]. <http://www.paulhensel.org/icowriver.html>.
- [22] 牛新春. 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J]. 现代国际关系,2014(4):1-9.

[作者简介]袁曦临,女,1968年生,东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7-01-06